

● 柳冬妩 著

从

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中国“打工诗歌”研究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中国“打工诗歌”研究

柳冬妩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
柳冬妩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2

ISBN 7-5360-4957-9

I. 从… II. 柳…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9695号

责任编辑：林贤治 张 懿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市长丰制版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印 数 1-3000册

印 张 9 1插页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957-9 / I · 3885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十几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农民工”进入东莞之后，我的写作、我的人生命运都与“打工”这两个字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呼应。时空的迁延形成了生命自身的秘密。从写“打工诗歌”，到写“打工诗歌”评论，我一直沉缅于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早期写作的“打工诗歌”作品可以看作是我个人的精神传记，后期写作“打工诗歌”评论，则使我看到那么多类似的心灵在诗歌里穿行和歌哭，连接着大地、肉身与灵魂。收入《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里的文章，除了《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写于1995年外，大多篇什主要写于新世纪之后的两三年内。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完全沉入“打工诗歌”这样一种诗歌心境中，在这同一领地，我与更多零散的、默默的“打工诗人”在各自孤独性的潜进中有缘相遇，使双方在一片对溅的光明与黑暗中互相看见并彼此享有。但基于将心比心的理解与感悟，我所理解的“打工诗歌”、“打工诗人”与“农民工”一样都是需要打入引号

的概念。这是一个大量使用引号的年代，我们随时可能被装在引号里。这是我们的宿命，是我们需要通过不断打入引号来回溯、透析、否定并试图超越的生活历程和内心体验。

任何一种诗歌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打工诗歌”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记载了数以亿计的乡下人向城市进军的历史足印，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打工诗歌”的创作无可质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诗歌经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透过诗人对于城市化过程的体验与感悟、痛苦与狂喜、骚动与喧哗，我们可以窥探到民族的命运。我们民族的灵魂生长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中，但从上个世纪末以来，高速运转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乡土中国的现实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产生了许多难以规约、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样态、新的审美因素与精神体验。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城市化对乡土中国来说，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漫长的转型过程，即知识的转型、价值的转型、审美的转型、道德的转型、理想的转型，以及由此统摄而成的精神的转型，或者说，这种转型就是文化的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嬗变过程。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表征，其核心就是现代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涉足其间，成为在场者，探入乡土生活纷杂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着乡土中国的整体脉动，指出它的存在，见证它的真实，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话语，最大限度地打开存在的遮蔽。在社会转型的迷茫中，诗歌突出表现了艺术的良知和力量，探索着人与社会的各种局限和可能。“打工诗歌”作为现代化与城市化趋势下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城市生活的主体性书写，城市与诗歌的关系，实在是一种互写和互塑的

关系。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打工诗歌”中的城市与乡村隐含了各种丰富的语义。诗人在城市里找到了新的认识体系，获得了新的感觉和想像力，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打工诗歌”其实是关于中国现代性叙述的一个丰富而细致的侧面，是以诗歌为方式对当代中国所作的一种想像性的构建，赋予转折的时代以启示和意义。

“打工诗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而是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那些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打工诗人”，把个人体验过的生活与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联系起来，写出“打工诗歌”，是他们的使命。或有同仁对继续沿用“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甚至不以为然，对此我深表理解。命名是对命名者的开示，也是对被命名者的遮蔽。遭受污名化体验的“打工诗人”，对抗污名让他们成为言说的主体。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打工诗人”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样，是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被污名化了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现实的出离，他们对“打工诗人”这个称谓的难言之隐，从本质上讲，正是一种本能性的文化警觉。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必须淡化现有“打工诗人”的身份，我甚至希望“打工诗歌”尽快自动消逝或者最终被“都市诗歌”所取代。作为“农民工”中最敏感分子，“打工诗人”往往最能深味并发现城市的新奇和限制。他们的书写，在中国辽阔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他们的写作与他们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他们身为历史主体的命运，命运背后存在着复杂暧昧的种种问题。

“打工诗人”的真实处境是：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擦抹的创痛，迎着都市文明无边的诱惑，他们所经历的内心生

活或内心经验是暧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生动地苏生。“打工诗人”的人生形式充满着对命运不懈的叩访和探寻，穿过种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抗的诗的世界，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人的心灵自由得到确立，使生存个体从暂时性的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的世界。与其说“打工诗歌”来自写作与语言现实之间的亲和力，不如说来自另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冲动，即致力于去蔽破障，使那些沉默（或被迫沉默）的事物从幽昧的黑暗中站出来，发出声音和光亮的诗本身的冲动。“打工诗人”从自己的个体经验领域出发，把握住现实和历史一闪而过的灵光，见证了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宏大叙事”，唤醒群体与个体沉默或被遮蔽的记忆。当然，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诗歌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作为“打工诗人”自身，他必须认识到，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题材的框架内。“打工诗人”不一定非要写“打工诗歌”不可，他的写作甚至要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他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和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将写作推向一个不断更新、日益深广的境界，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和尊严。

“打工诗歌”写作，也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网状的结构。

“打工诗歌”主要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但是“打工”进入了其他诗人的写作视野和意义世界，它的经验化入他们的感觉

结构中，使他们没有办法忽视它的巨大存在。不管是“打工诗歌”，还是其它的“底层写作”都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的评论中，我引用了一些“先锋诗人”写“打工”的诗歌，比如伊沙的《中国底层》。我甚至认为它是写的最好的“打工诗歌”之一，并于几年前把它编入到《中国打工诗选》里。以诗性的方式处理现实题材，一些“先锋诗人”率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体现了他们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先锋诗歌”与现实并不就是一种疏离状态，而是同样对时代作了鲜明而尖锐的发言，以此对社会正义、人性、文明和历史尽职尽责。“先锋诗歌”中出现的叙事性、反讽和喜剧化、口语化的写作倾向，就是这种立场和精神在诗歌中的体现。诗歌一直在承担着文学的基本责任，在所谓“底层写作”上，诗歌一直在正常地进行着，今天距离中国底层最近的是诗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有意为民请命，而是因为他们一直与底层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当文学批评界热议“底层如何文学？文学如何底层？”时，诗人早已先行一步，给予了有力的回应，演绎和延续了良知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不知是喜是忧，现在的“底层写作”已变成了一个主流的叙述，一个热门的叙述，一个时髦的叙述。在一些诗人写的“打工诗歌”里，对底层的姿态过高，精英色彩太浓，失去了人跟人交流的最基本的感情，变成了居高临下的一种怜悯。一些人为追赶题材的时髦而写作“底层”，或者将“底层写作”虚化，在写作时玩所谓的“美学脱身术”。“打工诗歌”也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圈地”中，被一些人急于转化成“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这样的写作对这个时代是没有交代的，它的不健康和虚假性对诗歌的伤害，在较长的时间里，是无法抹平

的。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运用自己的话语写作底层。问题在于，你是否能真正解读底层的诉求，想象底层人物的真实命运。

“打工诗歌”不是一个单纯的诗歌问题，甚至充满了歧义。“打工诗歌”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诗歌称谓的意义，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关乎“人类良知”、“公平正义”、“价值选择”、“社会承担”、“制度安排”、“身份焦虑”、“人生命运”、“灵魂皈依”这些被长久蔑视的概念和词语。这一时代，在部分诗人圈中谈论这些有时是需要勇气的。从根本上说，“打工诗歌”是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渗透、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包括旧制度的解体和新体制的建立），在传统诗歌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从现代性的角度看，“打工诗歌”的诞生是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身发展，与中国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生存方式和行为制约被商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大潮裹挟而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当然的固有的价值理想、道德原则饱受冲击和拷问乃至分崩离析时，“打工诗歌”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的产物。也正因如此，“打工诗歌”有时候成了一个“艺术污名”。在一些“纯诗”的鼓吹者看来，“打工诗歌”不是“真正的诗歌”，“打工诗人”不是“真正的诗人”，关于“打工诗歌”的评论也不是“真正的诗歌评论”。意义的理解在于人们对它的主观定义。“打工诗歌”以“不纯”的诗歌，却实现了捍卫真实的诗歌使命。在这一个案意义上，非诗歌的因素彻底战胜了既定的“纯诗”，那些“不纯的因素”构成了突入诗歌肌肤的芒刺。那些“不纯的因素”对诗

歌的强力加盟，并不一定是一种使诗歌堕入附庸的手段，并不一定没有遵循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一个强力型的写作者来说，那些不纯因素的纹理既构架了他表达的肌理，又垒立成了文体的骨头。我对“打工诗歌”写作的描述、阐释，以及由其所提出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大多都涉及到了“不纯的因素”。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发生了变动的语境中，始终保持反思精神的一些诗人同样意识到诗歌独立性的限度。他们既回避在诗中体现崇高感、道德感、精神关怀，也不因此而担心损害诗歌的创造性和艺术性。在当下，诗歌实际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之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诗歌可能代表意识形态对于种种未名的经验重新编码，诗歌也可能代表种种未名的经验挑战乃至修正意识形态。诗人和诗歌不可能改变时代，诗人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代言人，而只能成为他自己。但我相信，贯穿所有诗篇的那种思想、风格、精神来源，正脱胎换骨，预示着新的时代。

“打工诗歌”既然是诗歌，它肯定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自觉地遵从诗歌这种文体的内在要求，展开多个方面、多种风格的美学的尝试和试验，使诗歌的艺术使命和社会使命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我在一些文章中，对一些诗人陷入“唯形式主义”的泥淖表示了担心，但并没有将“打工诗歌”与诗歌的本体性和技巧性对立起来。对于“打工诗歌”，肯定要从美学和诗歌肌质上来评论和衡量。在“怎么写”的层面上，“打工诗歌”肯定有“好诗”与“坏诗”之分。这是一个简单的诗歌常识。即使对诗歌进行社会符号学分析，我也严格坚守自己的美学立场，坚决反对“题材决定论”，我不希望自己关于“打工诗歌”的评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如果不同时也是一次审美经历的话，我就写不出这本书来，甚至连一篇

论文都写不出来。我评论的对象更多的是成长着的“打工诗人”的创作，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阐释与分析，找到那些被感动、被启示的部分，用一种读者意识和感觉意识去试图接近一个被掩盖的现实，寻找和论证诗歌和现实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联系。我有许多非常熟悉的“打工诗人”朋友，在我的评论文章里从未出现过。他们一进入到写作的状态，就被诗歌固有的传统形式所规训所扼制，制约了对自我经验的表达。对那些把诗歌变成布道工具和精神容器的“精神妄想狂”，对那些靠炒作出名的“著名打工诗人”，对那些把“打工诗歌”当成口号来喊的写作者，我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使诗歌失落了艺术的美感，成为观念的附庸和教化的工具，成为失去了其独立的审美本体的精神客体。这一点，我也愿意读者更耐心一些，如果他真正深入到我的文字，他可能会有所理解。我也不敢将“打工诗歌”限定在狭义的题材和“伦理道德”层面，即使在“题材”和“伦理道德”层面来谈论“打工诗歌”，它也无法替代诗歌的其它写作元素。“写什么”与“怎么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它们永远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共同完成诗歌的写作过程。尽管“打工诗歌”写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打工生活却在“打工诗歌”中得到了涵义丰富、方式多样的表达。不知道有谁敢粗暴地认定“打工诗歌”写作是对诗歌美学的贬抑。“打工诗歌”的有力书写，恰恰来自诗歌内部，来自那些持有更坚定的“诗本位”立场、在写作方向和方式上更自主，更具个体色彩的诗人及其作品。如果把“打工诗歌”仅仅看作“集体命名”，甚至“媒体命名”，可能导致对个人诗学存在的简化和取消。当然，诗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我无意侵犯任何写作者的尊严和权利。

“打工诗歌”是一种新的诗歌现象，它有自己的产生根据、特征与种种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暴露出多方面的复杂性。研究“打工诗歌”，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打工诗歌”？如果在概念上纠缠，反而不易于问题的探讨。关于定义就留给有兴趣的人去费心吧。就像对“诗歌”的认识一样，对于这种命名的必要、可能和局限，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处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在都市经验的表达与传统的乡土抒写之间，“打工诗歌”具有了特有的过渡性、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多变性、未完成性。这种“中国经验”要求我们不能单向度的评介“打工诗歌”，无法先验地为诗歌写作树立一个统一的艺术标准，因为单向度的世界必然会失去意义生长的原动力。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每一种“诗歌”都留下了它的经验和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都是它的研究者所需要面对的。“打工诗歌”和其它底层写作一样，只是当下写作的一种姿态、一脉走向，但却体现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本质性的诗歌写作，既是个体感动的刻骨铭心，又是人类追问、期待与理想的精神幻像与普遍象征。相对于异彩纷呈、波澜壮阔的打工生活，相对于乡土中国前所未有的各种外在的生存矛盾和内在的精神变迁，诗歌对它的呈现只能算冰山一角。直到今天，我也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洞察了“打工”这两个简单汉字里的一切秘密。我也注意到一些诗人和诗评家对“打工诗歌”的不同看法，甚至是一种误读、偏见、成见或含有讥讽的批评，就是一些“打工诗人”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各种芥蒂，他们在个性色彩、精神特质、美学趣味上的差异不一而足。我能理解，在“诗人”这个称谓日益变得暧昧不明的当下，更遑论“打工诗

人”。我们对“打工诗歌”的认识，可能是根源于我们对现实和诗歌之间关系的一种体认，一种感受的不同。我想我应该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谦卑的姿态，认真倾听、分辨和过滤各种各样的声音，并随时地反思自己和纠正自己。“写作”是不可穷尽的。不同的声音也许会使我避免对“打工诗歌”的单向理解，而更多的看到事物纷繁复杂的一面。在内心深处，我也一直在质询着自己，意识到对“打工诗歌”进行一种整体性的描述是充满风险的。对每一位诗人而言，他创作风格的形成往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阶段性的特点也往往非常明显。“打工诗歌”写作所体现的乃是一个“个人写作”的时代，每一个诗人最终都只能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命运和语言本身的要求。

最后，我还想说，言说一种诗歌，首先要面对文本。诗歌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不同的阐释视角、批评方法，会导致阅读者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会解读出文本的不同意义，因此对文本的评价也就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但不管是哪一种批评方式，认真阅读文本是诗歌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批评主体对文本、诗人和诗歌的必要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尊重。文本细读不仅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不仅无法研究诗歌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品格，也无法研究外部力量对于诗歌的影响与渗透。“打工诗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并不缺少艺术含量较高的文本，而是我们缺少一种发现的精神，或者说缺乏发现的能力。我清楚地知道，研究“打工诗歌”需要做沙里淘金的精细工作，在浩大繁杂的诗歌写作群体中发现和选择一些有探索个性、有创造性的作品，向读者作一次审美阅读的整体性引导和推介。“打工诗歌”仍在继续，诗歌的力量，那种在复杂纠

葛中孕育着的精神、文化的印迹，我们也许还没有深刻地感受到。我仍然期待，并怀着耐心在阅读中寻找和发现。

2006年12月2日于东莞

目 录

自序 /1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1

农民：走在城市和乡村的线上 /5

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40

故乡：哪一枚坠落的是乡愁 /80

盲流：反抗背后的呐喊与疼痛 /98

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113

写作：鸟类永远不知道鱼类的心情 /136

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 /153

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155

生长在夹缝中的“打工诗歌” /164

打工者的精神牧歌 /173

“打工诗歌”离艺术殿堂还有多远 /178

校正认识 and 理解的坐标 /186

从知青诗人到“打工诗人”的境遇关怀 /193

上篇：凄凉的大地与个体的自我追问 /197

下篇：两个生存群体的精神隐喻场 /219

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 /239

在城市里跳跃 /255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